

# 从同盟角度看 日澳结盟趋向的原因及影响

张景全

(吉林大学 东北亚研究院,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 20世纪以来,日澳军事互动升温,逐渐呈现出在多边框架中的双边互动趋势,日益彰显军事互动的机制性,日澳关系结盟化。从同盟角度来看,日澳声称的共同威胁状况、日澳的结盟经历及其对两国的影响、日澳在文化观念上的相互认同状况是分析日澳结盟趋向原因的有益视角。日澳走向军事结盟的趋势对包括中国、美国在内的亚太及全球安全形势必将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日本; 澳大利亚; 结盟趋向; 原因; 影响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7411(2008)03-0048-(05)

**[收稿日期]** 2007-12-27

**[基金项目]**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日本对外结盟研究”(2007QN001)

获吉林大学“985工程”项目东北亚研究与东北振兴创新基地资助

**[作者简介]** 张景全(1971-),男,吉林九台人,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副教授,博士。

20世纪,日本与澳大利亚关系走过了从对抗到合作之路。21世纪初,日本与澳大利亚在双边关系上越走越近,日益凸显军事安全合作。2007年,日本与澳大利亚更是签署了日澳安全协定,召开日澳首次外长、防长级会议(2+2)。人们不禁产生疑问:日澳同为西太平洋地区两个发达国家并同为美国的紧密盟国,它们是否正在构建军事同盟?因此,从同盟角度解析日澳结盟趋向的原因与影响就显得十分必要。

## 一、日澳军事合作关系现状

日本与澳大利亚作为美国的盟国,在冷战及冷战后,均存在日美、澳美双边军事互动,但日澳军事互动相对较少。然而,21世纪初,日澳军事互动升温,逐渐呈现出新的特点,即在多边框架中的双边互动趋势明显、日益彰显军事互动的机制性。

首先,日澳的双边军事互动主要体现在多边互动框架之内。2000年10月,日本、澳大利亚与美

国、韩国、新加坡举行潜艇救援军事演习。随后,日澳每两年都参加此类演习。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后,作为美国的紧密盟友,澳大利亚与日本先后出兵伊拉克。在美国主导下的伊拉克,澳大利亚与日本之间进一步形成双边军事互动,两国的安全关系大大加强。美国提出“扩散安全倡议”之后,澳大利亚与日本均积极参加。2003年9月,澳大利亚、日本与美国、法国开始在澳大利亚东北部珊瑚海举行旨在拦截运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原料或毒品船只的联合军事演习。2003年12月,日本正式宣布加入美国导弹防御系统。2004年7月,澳大利亚也与美国正式签署导弹防御体系谅解备忘录。日澳均参加美国主导的导弹防御系统,表明日澳将可能在该领域逐渐展开必要的合作。日澳频繁的军事行动、军事防御与军事情报合作,为日澳军事互动的机制化提供了条件。

其次,日澳军事互动日益彰显机制化。2001年7月30日,在美国与澳大利亚一年一度的外交部长

和国防部长会议上,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唐纳首次提出“美、澳、日、韩四国安全磋商机制”的设想。<sup>[1]</sup> 2006年3月18日,在澳大利亚悉尼,美、澳、日举行了由美国国务卿赖斯、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唐纳、日本外相麻生太郎三国外长首次战略对话。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麦科马克认为,这是增加该地区美国同盟网络的一个努力。<sup>[2]</sup>

目前,日澳军事互动机制化最为明显的标志是,日澳安全协定的签署以及日澳外交、国防部长级会议(2+2)的召开。2007年3月13日,日澳之间签署安全协定,涉及反恐、海上安全、边境保护、救灾等内容。这是日本在美日同盟之外首次签署双边安全协议。2007年6月6日,日澳首次外交、国防部长级会议在东京召开。双方达成了安全保障协议,决定在朝鲜问题、对灾害地区实行人道主义援助、反恐政策上展开合作。此外,双方还在以下四个方面达成了合作协议:加速制定行动计划以确保日澳安全保障联合宣言的实施;展开人道主义救援行动的联合演习;针对恐怖主义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加强日澳、日美之间的情报交换;就援助太平洋岛屿国家问题展开对话。可见,日澳安全协定以及日澳外交、国防部长级会议不仅使日澳军事互动逐渐机制化,也使日澳军事合作的内容更加具体化,它是日澳关系“结盟化”的一个标志。

## 二、日澳结盟趋向的原因

日澳何以在21世纪初呈现结盟趋向呢?日澳各自的大国抱负、美国的驱动以及亚太地区变化等等,无疑都是解读的有益视角。但笔者将主要从同盟角度对以下三个方面展开探讨:日澳声称的共同威胁状况,日澳的结盟经历及其对两国的影响,日澳在文化观念上的相互认同状况。

日澳声称的共同威胁状况。结盟的基础是因面临共同的威胁而产生的共同安全利益。

首先,日本与澳大利亚所声称的威胁内容日益重叠。据1998年调查,被日本列为前三位的威胁是朝鲜(包括朝鲜半岛)、中国(包括台湾)、俄罗斯。其他诸如核扩散、石油、自然灾害、食品供应等也名列其中。<sup>[3]</sup>随着“9·11”恐怖袭击事件以及朝鲜核、导危机态势恶化之后,日本认为来自恐怖主义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威胁凸现出来。2000年,澳大利亚发表了霍华德政府第一份国防白皮书,认为美、日、中、俄、印等亚太5大国之间的关系存在变数,潜伏着发生对抗甚至冲突的可能。<sup>[4]</sup>2003年,澳大利亚政府公布了题为《澳大利亚国家安全》

的2000国防白皮书修正案,认为全球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对澳大利亚的安全构成了“真正和直接”的威胁。<sup>[5]</sup>可见,日本与澳大利亚在把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崛起、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视为威胁内容方面逐渐存在共识。

其次,日本与澳大利亚所声称的威胁方向逐渐契合。与冷战及冷战结束初期相比,日本所声称的威胁方向存在由东北向西南转化,即更加关注朝鲜半岛、钓鱼岛海域、台湾海峡、马六甲海峡甚至海湾地区。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所声称的威胁方向由与之紧密相连的东南亚、大洋洲北部岛屿向东北亚、西亚拓展。日澳在所谓的威胁方向上出现对接。于是,我们注意到,在某种程度上,日本与澳大利亚所声称的威胁存在这样的趋势:威胁内容日益重叠,威胁方向逐渐契合。

意欲结盟的当事国由于面临的共同威胁而产生了结盟外交的动力和意愿,而其历史上的结盟实践及其影响效果会强化或弱化当事国的结盟意愿,并最终影响结盟实践。

日本与澳大利亚都曾经经历并正在实践着对外结盟。1902年,日本与英国缔结日英同盟,随后在100余年的时间内,日本又先后缔结日德同盟、日美同盟。20世纪中期,面对日本的侵略扩张,澳大利亚在战争时期与美国结成事实上的同盟。<sup>[6]</sup>1951年9月,澳大利亚与美国、新西兰签订《美澳新同盟条约》,澳美同盟正式缔结。日本自20世纪初到21世纪初一百余年的70%以上时间都处于结盟状态,澳大利亚在20世纪中期至21世纪初半个多世纪时间内都处于结盟状态,至今日本与澳大利亚所参与的日美同盟与澳美同盟仍在运转。

那么,日澳对外结盟实践对日澳两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日本对外结盟促使日本两次崛起、一次衰落。“日英同盟的20年”,使“原先毫无现代工业基础的位居远东尽头的岛国日本,逐渐跻身于世界五大强国的行列,成了三大海军强国之一,在国际上迅速崛起。对于日本而言,这是‘创造奇迹的20年’”。日美同盟建立后,日本“依靠这个同盟在‘战后复兴、经济大国化’中经历了‘民族的奋进时期’”,<sup>[7]</sup>日本第二次崛起。尽管日本对德结盟曾经使日本一度衰落,但是,日德结盟与此前的日英结盟在最终目的上存在一定的连续性,仍然是要获得世界大国的地位。“日本通过在1902年与英国结盟,在一战时(继续)结盟参战,……后来在20世纪30至40年代与轴心国合作,其目的是努力赢得世

界级国家的承认”。<sup>[8]</sup>澳大利亚经历了由最初在安全上依赖英国,到与美国结盟在安全上依赖美国的历程。澳美同盟不仅使澳大利亚获得了安全,而且使其获得了美国在经济、资金及市场上的支持,澳大利亚逐渐成长为亚太地区重要的国家。

日澳的结盟经历以及结盟经历对各自国家发展的影响,促使日澳两国产生了依靠大国、进行结盟的战略判断。有学者指出,“在安全上依靠一个大国是澳大利亚政治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这一点两大政党(执政党自由党和反对党工党)没有根本分歧”。<sup>[9]</sup>“国际舞台上谁独占鳌头,日本就会出于自我利益而跟谁结盟:1902年到1922年追随英国,1936年到1945年追随德国,1952年起则紧跟美国”。<sup>[10]</sup>日澳为了应对亚太地区变化、实现各自的大国抱负,两国各自的结盟经历与经验无疑对日澳的结盟趋向起到了某种路线图的作用。

日澳在文化观念上的相互认同状况及其对日澳结盟趋向的作用。日本与澳大利亚在地理上分别处于东北亚与东南亚边缘,进而均处于亚洲大陆的边缘。日本在近代提出“脱亚入欧”,澳大利亚则主要是西方移民建国。因此,日本与澳大利亚在一定程度上均身处东方而心系西方。地理与文化上的边缘位置以及地理与心理的错位,使日本与澳大利亚产生出定位困惑、孤立观念以及强烈的危机意识。“日本是否应该‘回归’亚洲,还是应该作为被发达的西方世界接受的一员而离开亚洲,关于这个问题,日本已经争论了百余年”。<sup>[11]</sup>彼得·J·卡赞斯坦写道,日本“容易产生在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下被挟持的感觉,这在日本人的思维方式中起着强有力的支配地位”。“日本的外交政策选择‘出于一代又一代的、面临着内外各种压力的政治家们的集体信念,他们共同相信,世界是不安全的’”。<sup>[12]</sup>澳大利亚前总理保罗·基廷曾强调,正如澳大利亚不能成为、也不愿成为欧洲、北美或非洲国家一样,澳大利亚不是、也永远不会成为“一个亚洲国家”。<sup>[13]</sup>澳大利亚“常常感到自己是盎格鲁—撒克逊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的孤立前哨,与实际敌对或潜在敌对的亚洲国家比邻而居”。<sup>[14]</sup>

日澳相似的孤立观念、定位困惑以及危机意识,在变动中的亚太环境和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也促使日本与澳大利亚在经历了20世纪前半叶的敌对与冲突后逐渐接近。布鲁斯·拉西特、哈维·斯塔尔认为,“选择盟国不应当受到非军事因素的影响,比如意识形态或道义。但是,国家之间的相似性,包括合作关系、意识形态、历史、观念,都对国家

选择同盟的行为有重要影响”。<sup>[15]</sup>塞缪尔·亨廷顿也强调,“军事同盟和经济联盟要求成员国之间进行合作,而合作有赖于信任,信赖最容易从共同的价值观和文化中产生”。<sup>[16]</sup>

### 三、日澳结盟趋向的影响

日澳走向军事结盟的趋势对包括中国、美国在内的亚太及全球安全形势必将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日澳结盟趋向将对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带来负面影响,并可能修改地区及全球安全主题。无疑,日澳存在通过结盟以获得自身安全的一面。然而,安全困境的普遍存在以及结盟的鲜明军事性特点,极易激发同盟所在地区的紧张气氛。因此,尽管古往今来的结盟构建者几乎都曾强调它们结盟的目的是为了和平与安全,但没人能够否认,历史与现实一再证明,结盟趋向的出现往往伴随着安全形势紧张的出现。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无不如此。一方获得安全的结盟努力被另一方视为对自身安全的威胁,从而可能使后者也随之通过结盟努力来期盼获得必要的安全。结盟在增强结盟者自身安全感的同时,也使结盟成为结盟者自身不安全的制造者。1914年8月,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一位德国官员绝望地评价道,“这一切都来自这种该死的联盟体系,它们是现代的祸根”。<sup>[17]</sup>

日澳结盟趋向对地区及全球安全主题可能存在的修正作用不能被忽视。“9·11”恐怖袭击事件以来,全球安全主题主要集中在反恐之上,传统安全主题——以主权国家之间的威胁为主——逐渐弱化。在应对恐怖主义的背景下,国家之间的对抗性减弱,结盟受到质疑。“因为只有在一个可预见性的世界中,当相关国家面临共同威胁的时候,这些国家之间才会产生正式结盟的动因与凝聚力。然而当今的世界一切都变得难以预料,我们无法预测主要的威胁是什么”。<sup>[18]</sup>但是,日澳结盟趋向有可能改变这一切。作为亚太地区重要的经济及军事强国,日澳结盟将是强强结盟,而强强合作的军事同盟声称以恐怖主义为针对对象,不能不在引起普遍不安的同时引起普遍的质疑:同盟作为昔日国家间对抗的工具今日作为国家对抗恐怖主义的工具,这对各国的未来安全主题的判断意味着什么?究竟是强化反恐还是回归对抗国家间威胁?

日澳结盟趋势对日美同盟及澳美同盟主导者美国的影响。笔者认为,日澳结盟趋向短期来看有利于美国,但从长期来看,则不利于美国。如前所述,

日澳军事互动主要是在多边框架之下,具体而言是在美国的主导之下,这反映了美国对日澳同盟构建的意愿与努力。美国寄希望美日澳之间进行更紧密的合作,以应对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世界。但是,一方面存在日美、日澳同盟,另一方面是日澳双边关系以及日澳对亚洲尤其是对中国热衷于经贸关系,日澳在经济、政治上融入亚洲对日美、澳美同盟的冲击是难以预料的。2001年8月,力挺日美同盟的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曾敲打澳大利亚,“联盟并非为了政治方便或是经济整合。对我们来说,联盟意味着责任,如果需要,它意味着为对方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这就是联盟的意义所在”。<sup>[1]</sup>2007年2月,阿米蒂奇、美国前国防部助理部长约瑟夫·奈等美国共和、民主党的主要亚洲专家发表了题为《阿米蒂奇报告06的政策建议》,该报告提出,为应付中国及印度的抬头,主张强化日美同盟。在一定程度上,日澳结盟趋势的发展,可以起到在澳中与日之间增加芥蒂、在日澳进而在美澳日之间实现进一步捆绑的作用。而一旦日澳与日美、澳美三架同盟马车完成组合,将有利于美国南北规制亚太、东西辐射非拉。

然而,美国不能仅仅享受日澳结盟对其带来的益处,它对美国而言也存在风险,从长期来看尤其如此。这是因为基于以下判断。其一,操控日益庞杂的同盟体系存在风险。一方面,美国会继续被牵涉进越来越多的盟友所带来的矛盾与冲突之中。结盟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制造所谓安全的同时也在制造不安全,在获得盟友支持的同时也在受到盟友的牵连。另一方面,操控日益庞杂的同盟体系本身就存在风险。俾斯麦德国的同盟体系说明了这一点。有学者指出,“俾斯麦同盟体系具有灵活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德国处于该体系的中心,俾斯麦就好像一个能使几个球不落地的魔术师”。“然而,复杂性也是该体系的缺陷。当俾斯麦被其不太高明的继任者取代以后,这个同盟体系就不能继续维持下去了”。<sup>[19]</sup>其二,日澳主要出于实用主义看待同盟问题,日澳结盟越是巩固与成熟,日美、澳美同盟可能就越动摇和弱化。日澳希望通过结盟实现各自的大国抱负,两国均自视为“太平洋地区南北间的重要支柱”。<sup>[20]</sup>日澳结盟将使处于日美、澳美同盟阴影之下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日澳获得一定的独立倾向,而独立地表达自身的愿望是大国地位的一个表征。因此,日澳轴心一旦成型并成熟,或者日澳实现了大国抱负,日澳两国能否继续甘当美国在亚太的“南北双锚”就另当别论了。

日澳结盟趋向对中国的影响。尽管日澳双方都一再强调日澳安全协定不针对中国,但是,试想毗邻一国的两个强国家逐渐结盟,而结盟趋向明显的当事国却希望前者息事宁人,这是很难想象的,正所谓“威胁的邻近性经常影响国家对威胁的认知”。<sup>[19]</sup>尽管日澳均强调两国针对的主要是恐怖主义,但诚如新现实主义联盟理论的旗将斯蒂芬·沃尔特所指出的,国家制衡的主要是对自己构成最大威胁的国家。<sup>[21]</sup>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涌现的新兴国家往往被传统强国视为威胁,而由于后者在现存秩序中仍处于一定的优势地位,因此它们往往会采取包括军事结盟在内的更加咄咄逼人的战略,以回应地区和全球地缘政治及地缘经济的巨大变迁。<sup>[22]</sup>有学者指出,“布什政府正系统地努力遏制中国崛起及中国在亚洲的影响。他们提出的三个主要目标是:将日本、澳大利亚和韩国的现有关系转变成强大的、完整的反华联盟体系;把其他国家尤其是印度纳入到这个体系中;扩大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力量”。“把澳大利亚纳入到这个明显反华的组织是赖斯的首要任务”。<sup>[23]</sup>对此,日澳存在一定的认同并作出了回应。于是人们看到,继日美同盟、澳美同盟强化之后,亚太地区又出现日澳结盟趋向。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而言,这一系列行动可能产生4种趋向。1. 震慑并规制新兴国家,使新兴国家与现存秩序更加合作,“融入”国际社会。2. 分裂新兴国家,吸引和胁迫一些新兴国家加入同盟体系,孤立另一些新兴国家。3. 刺激新兴国家,促使新兴国家采取包括结盟在内的对抗措施,在对抗中耗散其力量。4. 结盟趋向可以制造紧张空气,从而抑制甚至逐渐窒息新兴国家的经济活力。日澳结盟趋向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的负面作用不可小视。

同时,笔者认为,同盟参与国往往存在一定的同盟视野,所谓同盟视野是指缔结同盟的国家通过同盟所谋求的安全、军事、政治及经济关切的范围,它主要通过同盟条约中的同盟覆盖区域的形式体现。同盟覆盖区域不仅意味着同盟参与国的权利和义务主要发生在该区域以内,也意味着对介入或将要介入该区域的他国起警示作用。日澳连线紧邻东亚东部边缘、纵贯西太平洋南北,中国台湾地区、中国远洋航线均处于该线。因此,如果日澳结盟趋向继续发展,日澳缔结更加紧密的军事同盟,对中国的不良影响会进一步地表现出来。

但是,我们应对日澳结盟趋势保持冷静和克制的态度和政策。事实上,日澳两国对威胁的认知、对结盟经历的认知以及对文化观念的认同也存在着明

显的差别。澳大利亚与中国没有历史问题、领土问题,并且澳中经贸往来持续升温,因此它对中国的威胁认知与日本对中国的威胁认知不同。在历史中,澳大利亚主要视结盟为防范外来侵略与威胁的工具,例如,澳美结盟对抗日本入侵;而日本在结盟后往往走向战争,例如,日英结盟后发动日俄战争,日德结盟后发动太平洋战争。澳大利亚强调文化种族多元,而日本是单一民族国家。日本与澳大利亚在二战时兵戎相见,二战后两国对此存在不同的认识。

随着日澳国内政治发生微妙的变化,福田康夫代替强调“共同价值观”外交的安倍晋三,凯文·拉德代替力主紧随美国的霍华德,日澳结盟趋向的发展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只要中国与包括日澳在内的广大亚太国家继续保持活跃的经济、文化往来,加强政治、军事沟通,以实力促合作谋和谐,在亚太地区创造合作、和谐的氛围,日澳结盟将失去意义。

#### 参考文献:

[1] 胡春凯. 美澳日韩:“四国帮”[J]. 南风窗, 2001 (9): 76-77.  
 [2] Steven R. Weisman. Rice Seeks To Balance China's Power[J]. New York Times, Mar 19, 2006.  
 [3] Kevin J. Cooney. Japan's Foreign Policy Maturity: A Quest for Normalcy[M].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2: 109.  
 [4] 孙晖明. 澳大利亚的两次军事调整[J]. 国际资料信息, 2001, (7): 23  
 [5] 李景卫. 澳大利亚寻求美国保护伞[N]. 人民日报, 2003-03-10  
 [6] Raymond A. Esthus. From Enmity to Alliance: US-Australian Relations, 1931-1941[M].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44  
 [7] [日]寺岛实郎. 呼吸历史——对亚太区域的人文思考[M]. 徐静波, 沈中琦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88, 181

[8] Wolfm endl. Japan's Asia Policy: Regional Security and Global Interests[M].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5: 38  
 [9] 孙晖明. 霍华德的一场赌博[J]. 瞭望新闻周刊, 2003 (14): 57  
 [10] [美]罗伯特·A.帕斯特. 世纪之旅:七国外交风云[M]. 胡利平、杨韵琴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269.  
 [11] Gerald L. Curtis.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Asia[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4: 228  
 [12] [美]彼得·J卡赞斯坦. 文化规范与国家——战后日本警察与自卫队[M]. 李小花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2: 132  
 [13] [澳]迈克尔·莱特沃勒. 澳大利亚的亚洲政策及澳中关系[J]. 朱艳译, 当代亚太, 1994 (4): 27.  
 [14] [美]罗伯特·基欧汉, 约瑟夫·奈. 权力与相互依赖[M]. 门洪华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189.  
 [15] [美]布鲁斯·拉西特, 哈维·斯塔尔. 世界政治[M]. 王玉珍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1: 84  
 [16] [美]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 周琪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8: 136  
 [17]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 全球通史: 1500年以后的世界[M]. 吴象婴, 梁赤民译,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2: 580.  
 [18] [美]理查德·N.哈斯. “规制主义”——冷战后的美国全球新战略[M]. 陈遥遥, 荣凌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9: 152  
 [19] [美]小约瑟夫·奈. 理解国际冲突: 理论与历史[M]. 张小明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82-78.  
 [20] 宋成有, 李寒梅. 战后日本外交史: 1945—1994[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5: 576.  
 [21] Stephen Walt. Alliance Form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World Power [J].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9, No. 4, 1985 (Spring): 10.  
 [22] 杨鲁慧. 东北亚地缘政治变迁与中国崛起的安全环境[J]. 东北亚论坛, 2007 (3): 43-49  
 [23] [英]迈克尔·克莱尔. 遏制中国[J]. 徐华摘译, 国外理论动态, 2007 (1): 40

〔责任编辑 李英武〕

## The Reason and Influence about Japan and Australia's Alliance Tre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lliance

ZHANG Jing-quan

(Northeast Asia Studies Academy,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12, China)

**Abstract** From 21st century, Japan and Australia's military interaction is showing new features which include the trend of bilateral interaction in multilateral framework and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military interac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apan and Australia is turning to be align. If we research the reason of Japan and Australia's alliance trend from the alliance perspective these aspects are useful: the conditions of so called common threat which Japan and Australia are declaring, Japan and Australia's alliance experiences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m, and the conditions of mutual identity between Japan and Australia in culture and conception. Japan and Australia's alliance trend will produce great and deepen influence on Asia Pacific and global security situation which includes America and China's.

**Key Words** Japan, Australia, trend of alliance, reason, influence